

忆
往昔

报纸糊墙的岁月里

□ 王妙瑞

50多年前的弄堂老家墙壁毛糙，涂过一层白石灰。而考究一点的人家，是从文具店买几张花纸糊墙壁。我家8口人仅靠父亲一人干活挣钱，经济条件差，做啥事情都要精打细算，所以只能用旧报纸糊墙壁。母亲文盲不识字，我和弟弟读小学，家里不订报。父亲上班的新光内衣厂是大厂，当然有各种报纸，但他说公家的旧报纸一张也不可以拿回来的。每天下午卖报声传来，“吃好夜饭看夜报”。隔几天我到邻居家去讨旧报纸，一张一张保存好，成了不花钱的“墙纸”。

夜报也叫“申报纸”，母亲和弄堂里的大人都这样叫。长大了我才知道申报是上海最老的报纸，老上海人普遍认可这种泛称。糊报纸的浆糊是母亲做的，她把面粉调成很薄的糊状，倒在小锅里放煤球炉上烧了起泡取下，冷却后便可用了。她先在墙脚下糊一张报纸，叫我们学着做。那时的大人习惯培养小人的劳动意识，八九岁的人会生煤球炉，常到菜场排队买小菜。小人糊报纸有点难，不像母亲会绣花手很巧，我们把报纸贴得像满脸皱纹的老人。母亲在一旁说，不要急，慢慢来，报纸先贴牢上头往下轻轻地捋，耐心才能铺得平。贴过几张后有了体会，铺出来的墙面比较平整了。父亲是厂里的八级熨烫工，我说自己贴的报纸跟你烫的衬衫差不多平整吧。父亲

说差远了，新光牌衬衫出口，周总理都称赞做得挺括。

18平方米的小家糊满了报纸倒也别致。我有5个弟妹，家里搭了双层铺，夜里我睡上铺，站不起来，刚好能坐。屋顶糊了晚报，睡觉的一头，糊的报纸比较新，有前两天的，躺下来能看到每行标题，闻到一丝油墨香，我与晚报的缘分就这样开始了。

“文革”中晚报停刊，讨不到报纸了。1978年底当了10年兵的我回到了上海，分配在江西中路215号老市府大厦的市级机关工作。晚报复刊时，临时社址在九江路邮局对面的花溪大楼4楼，我走过去只要五六分钟；还当了晚报通讯员，“本报讯”在一版登了不少。

我每天买晚报看，但家里糊墙壁用不着旧报纸了，因为墙面全部涂油漆了。弄堂里的邻居来参观，称赞上档次。后来流行贴墙纸，我看上了高雅亮丽的意大利天地牌墙纸，感觉这样的装潢到顶了。

千禧年，我买了100多平方米的新房，层高3米，墙面多了、宽了，也大了。而比墙纸更新颖的装修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艺术墙、电视墙、投影墙、音响墙、搁书墙、藏品墙等数不胜数。

一晃，入住新小区20年，家里的墙壁有点像秋叶泛黄该重新装潢了。70岁的人钟情简约，但装修材料一定要好。一堵墙要做成一道景，能勾起我对人生最有趣味的回味。想到与晚报的情分久远，

就做一面晚报墙吧——38年前在晚报发表第一篇新闻作品的样报还在，说的是杨浦区江浦路街道某居委党支部书记薛福娣关心特殊群体的婚姻事，帮助5对残疾青年成了家；十多张《谈家常》文章小样也在；晚报召开通讯员电影联谊会，刚好谢晋导演应邀来参加我局的一个会议，我请他在晚报特别印制的电影票背面签了名。历史资料装进镜框挂在墙上，见证了我们的40年晚报情。

每天乘电梯下楼取回信箱里的晚报，尤其喜欢看夜光杯副刊，时而有我写的文章，坐在摇椅上一边看，一边喝咖啡，逍遥自在。窗外的风从精致的墙面上吹过，昔日夜报糊墙的情景再现眼前，一种生活的幸福感在心里荡漾。



凌霄点点红

江俊明 作

□ 沈永昌

当前，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育人理念，正在中小学校中得到贯彻落实。我不禁想起金山区山阳中学退休教师吴永祥曾提出的“8-1>8”的教学模式。

“8-1>8”，是吴老师五十多年教育实践摸索得出的。吴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如果学生一天的学习时间是8小时，那么拿出1小时用于课外活动，如美术、体育等，产生的效果好于8小时全部用于学习文化知识。

上个世纪70年代，吴老师就提出“让每一位农家子弟至少会一门乐器”。他的这一举动，对于崇尚升学率的应试教育年代是何等另类。吴老师认为艺术教育不只是特色，还是促进学生持续上进的一种审美动力。师生共同享受着充满激情的课堂，课堂就成为师生共同向往的地方。

在
现场

□ 张荣权

上午还是好好的太阳，下班时突然就刮风降温。

女人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往回赶，米色风衣的下摆在风中飘在半空。

拐入巷道时，自行车差一点撞在一个黑影上。她一个敏捷地急刹，定睛一看，是一个老妇人用黑塑料袋遮着身子防风。地上有一小摊极新鲜的荠菜（一种野菜）。菜叶青翠，菜茎红嫩，是好菜。刚才老人许是去捡被风吹走的野菜而挡了女人的道。

老妇人连声地“对不起”。女人问：撞着没有？又说：我没事。老妇人黑黑的皮肤，脸上纵横沟壑的沧桑，一双手犹如老榆树皮的黧黑。面前一片围腰，沾满的泥土已很少看到原来的布色。

天冷风大，怎么还不回家？这些荠菜没卖掉，卖了就家去。女人低头看向那些荠菜。凭着在农村工作过的经验，知道这是早春中的野生菜。

老妇人急急地介绍：这是我带早从圩埂上挑来的。保证是野生的。我们家没有大棚，大棚里的菜是另一种味道。

女人听着老妇人介绍，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幕幕画面：料峭的风中，老妇人挎着篮子走在乡间的田埂上，她很熟练地用小镰刀挑挑着，一棵，一棵。

女人回过神来，问：你不是有农保吗？不够生活？怎么还要在这寒风中受冻？

老妇人兴奋起来：我是看到满堤岸的好荠菜不挖了可惜。不挖它也是老。老妇人又近前一点低声说：孙子上大学了，我做奶奶的给他点钱，他高兴我就高兴。

女人听了，眼里尽是尊敬。多好的中国老人呀！

老妇人见女人不说话，迎上去，热哈哈地问：你买点荠菜吧，包你味道好。

女人想都没想，说：都称给我吧。老妇人先是意外一惊，立刻反应过来了：这一共五斤一两，就算五斤。卖人家十一块一斤，你连篮子倒（一次全部买下），算你十元一斤。你看好不好？老妇人等着再讨价还价。

女人说：你帮我弄个大塑料袋装好。然后从小包中取出一张百元钞票，塞到老人手中：别找了。早点回家吧，天这么冷。

老妇人又一惊：这么多？怎能不找呢？你是好人，我这不是跟好人卖黑市了吗？说着就满口袋找钱。

女人用手捉住老妇人翻口袋的手：别找了。以后有好野菜再送点给我。说着，把鼓囊囊的一个塑料袋绑到了车龙头上……

身后一辆小车开过来，近前摇下车窗，一个小年轻探出头来：张市长，你家三口人买这么多菜？我给你送回去吧？

女人摇摇手，风中不知她说了什么。

风还在吼吼地刮，老妇人走起来已不觉得冷。

风
中
的
温
暖

买毛笔

□ 赵韩德

我在浦东小镇的民生小学读书时，大约四年级的时候，说是要上写字课了，写毛笔字。彼时的人比较朴实，课名也很了然，比如手工课、写字课。现在则另有高档次说法，叫创意课、书法课。

那时我们都是弄堂口小店买“金不换”笔和墨。牌子名称有点吓人，价钱其实非常便宜，一毛钱左右。我们的头儿是剃头店小开，一个能够事事无师自通的家伙，提倡出来的东西，从者如云。他说须买个铜笔套，毛笔写好后带着墨汁塞进铜笔套，下次就可直接用了。可是这样几次下来，我的毛笔就胶住且脏，非常不好使，短时间内换了两三支“金不换”，母亲很生气。终于有一天，父亲对我说，带我到“上海（浦东人的说法，指去市中心）”去，到朵云轩去“好好较”买支毛笔，再听听里面老师傅的说法。

母亲把我衣服换得“山清水绿”，我跟着父亲乘摆渡船，乘当当当的有轨电车，到外滩，到南京路，走进富丽堂皇的朵云轩。锃亮的柜台，满墙的书画，琳琅满目的文房用具，使我这个乡下娃瞠目结舌。

而今回想起这件细事，慢慢咀嚼，方觉味儿重重，意味深长。

像父亲这样的老上海是非常可爱的，他们真诚相信本地品牌。夏天买六神丸金银花露，冬天配膏方，要到董涵春；节日里买菜要上虹口三角地；过年买猪油松糕八宝饭，要到南京东路沈大成；平时品尝糕团，经常是乔家栅、沧浪亭；而

叉烧包伦教糕，要去杏花楼……

父亲骑了一辆“老坦克”自行车满城兜。他嘴里叨叨的这些店家名称，在我小小的心里常常会产生诗意，简直像唐诗。在天井里葡萄架下，坐在小竹椅上，我呆呆地很诗意地幻想：搗沙团子、缙纱小馄饨、蟹壳黄、糯米八宝饭、重油素菜包、肉丝春卷、猪油糖年糕；沧浪亭、乔家栅、大壶春、五芳斋、王家沙、绿杨村……尤其“绿杨村”三个字，梨花春雨的小村庄，居然化作一片点心店的招牌，太佩服。

买一支毛笔要上朵云轩，对父亲而言，显然是让我这个土孩子，看看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又，父亲固然无意，对我而言确实有一种现在所谓的仪式感，感到一种庄重。买名牌，哪怕是一支小小的毛笔，到朵云轩买和在弄堂口买，不说质地有多大区别——其实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根本体会不出——但是，那意义却确实大不一样。朵云轩的书画墨香，典雅气息，对一个娃娃而言，是朝拜的殿堂。此后，朵云轩几乎成了我的一种文化向往，长大后，隔些日子就要去看看，沉浸一下氛围，成了毕生的爱好。任何书画展，哪怕级别再高，在我心里，只有轮到在朵云轩展出的作品，才是真正的精品。现在回想值得自我珍惜的一件事，就是年轻时经吴建贤先生推荐，我以张黑女风格写的一副春联，曾经在朵云轩大堂的边墙上挂出过，我也曾做过一阵子它的通讯员。

父亲替我买了支“善莲湖笔庄”纯羊毫大楷。店堂里老师傅说写后必须洗净，挂起，晾干。

『双
减』
路
上
的
先
行
者